

城乡校园为何冷热失衡

本报记者 余英茂



城镇中小学“人满为患”

分家长有了钱,就更加重视教育,纷纷把孩子送到教育条件较好的城镇学校就读。余集镇曹集村的学生家长吴泽金向记者坦言:我只有一个儿子,农村的学校教育质量太差了,我当然想让孩子上城里的学校。城里的学校都配备了空调、多媒体教学这类设备,特级教师、高级教师也很多,而在农村,有高级教师的学校也很少。

城镇“超级大班”频现

城镇的中小学和农村的“空心学校”相比,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。

记者在郑州市区几所中小学了解到,超过60人的班级在郑州市区的小中小学中占有很高比例,班级人数超过80人也并非个案,为了避开后排的学生听不清楚,一些老师不得不戴着话筒讲课。而许昌市中的一个班,竟然有127名学生,被媒体称之为“超级大班”。

“超级大班”不仅存在于郑州、许昌这样的大城市,我省各地城镇中的“超级大班”也层出不穷。有着165万人口的固始县是我省第一人口大县,走进固始县的校园,记者发现都是学生爆满,大多数班级都在80人左右,教室里的学生挤得像瓶里的罐头。

在固始县第三中学的教室里,记者看到,一间只有60平方米左右的教室,却挤着80多名学生,学生的课桌已经挨着教室的墙角,学生下课时,碰到其他同学,挂掉书本等现象时有发生。由于场地拥挤不堪,学生下课后没有地方活动。坐在教室后排的学生说,由于人太多,经常被前面的学生挡住视线,看黑板上的字很费劲。

固始县常年外出务工经商者达50万人,是

全国第一劳务大县。农民外出打工挣钱之后,一些家长“望子成龙”心切,趋之若鹜地把孩子送到固始县城就读。为了挤进县城的名校,很多家长不惜买房子、托熟人、找关系,有的甚至让孩子的爷爷奶奶、姥姥姥爷租房陪读。

在固始县,慈济高中、永和高中、慈济附中、县三等中等都是知名度较高的学校。慈济高中工委会的朱主席告诉记者,他们学校招收的外地学生也有不少,像信阳淮滨县、安徽霍邱县的学生来到该校就读的就有不少。固始三中初中一年级招收了20个班,该校副校长王仁堂介绍说,他们学校招收的新生每个班级多接近90人,学校不得不把学生寝室改作了教室,依旧是“僧多粥少”。

固始县教育局党委书记戴志武告诉记者,随着当地经济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,固始县城的框架不断拉大,城镇居民不断增多,农村学生纷纷转向城区学校就读,农村学校优秀教师也纷纷往城镇调动,导致农村高中几乎都垮掉了,城镇入学压力却日益增大。固始县所在的信阳市教育局的领导在会上批评说:“现在的家长都争着把孩子往城镇里送,导致师资力量不足,真是误人子弟。”

当地的一位中学校长认为,农村生源减少,最根本的原因是城乡差距过大,教育资源分配严重失衡。农村学校硬件设施不足,缺这少那,特别是偏远的农村学校,很多优秀教师都待不住,导致优质教育资源越来越集中在城市。家长们理所当然的要把孩子往城里送。

一份固始县“十一五”新农村规划建设情况显示,该县有321所寄宿制中、小学校需要改扩建,有32所学校条件达不到要求的农村薄弱初中需要改造,要改变现有的教育基础设施

不足的状况,需投入资金2.26亿元。然而,固始县是国家级贫困县,当地一位政府官员告诉记者,解决农村学校建设滞后的问题困难重重,一时是难以解决的。

为控制县城的学生人数,不至于挤破教室,固始县有些学校只得借读费作为入学门槛,尽管如此,仍然挡不住农村生源的涌入。

村村办小学将成为历史

随着城镇化加速推进,农村中小學生逐年减少的趋势不可逆转,乡村学校继续维持“小而散、小而全”的办学形式,既浪费人力、物力,也难以保证教育质量,进行中小学布局调整势在必行。

乡村“空心学校”的状况,很早就引起省教育厅的关注。早在2006年11月,省教育厅就出台政策,提出用“定点布局”的办法,用五年左右的时间,合理调整农村中小学布局。

按照省教育厅的部署,在方便学生就近入学的前提下,我省各地将按照相对集中、规模适度的原则,合理调整农村学校布局,适当扩大办学规模,有计划、有步骤地调整、撤并一些规模较小的农村学校。推进初中向乡镇所在地集中,有条件的学校逐步实行寄宿制。在交通不便或距离较远的村保留必要的教学点,方便学生就近入学,逐步形成中心小学、完全小学、教学点相互关联的网络结构。这就意味着,明年如果完成农村学校布局调整,我省将打破村村办小学的“小而全”的历史模式。

城乡校园失衡窘境有待破解

城镇学校“超级大班”频现和农村学校生源不足的双重窘境,已成为我省城乡教育均衡发展亟待破解的难题。

据省教育厅统计,目前全省城市小学、初中平均班额为57人,县镇小学平均班额55人,初中63人,均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,有的城镇初中班额甚至超过100人。同时,部分农村地区出现了生源不足现象,个别农村小学存在着几名学生十几名各年级学生的情况。

不仅仅是我省,全国很多地方都遇到了农村生源匮乏的尴尬。据教育部统计,10年前,全国中小学总数是60万所左右,现在只有40万所,减少的多是乡村学校。

农村学校由于生源不足无法形成办学规模,如果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,城乡教育差距将进一步拉大。

9月16日召开的全省教育工作会议提出,我省要抓紧研究制定城乡中小学布局调整规划方案,加快城乡教育结构布局调整,农村地区要适度集中、规模办学,主动适应城镇化进程。

新闻时评

编辑 陈培营 杨怀锁 电话 67655282 E-mail: znxw@znews.com

严打囤地如何让重拳落到实处

我是中午吃饭的时候,在电视上看到的这则新闻。当时母亲也在看,她对此点评说:“打死俺也不信”:别说一年,咱们那地的地,闲十来年的都有!母亲是个不识字的老太太,不懂经济学,也不懂楼市政策,她的判断,只来自身边的事实和朴素的经验,以及对于儿子住房问题的焦虑。

这种焦虑当然是有代表性的,人民网一项大型调查显示,超过九成的网友不满当前房价,同时,八成多网友认为楼市调控政策落实不力。(9月27日《人民日报》)结果已经非常明显,房价居高不下,按下葫芦又起瓢,公众认为主要原因不是没有调控手段,而是政策落实不力。此次两部门的通知,重点落在打击囤地和保障房供给,把脉不可谓不准,如果贯彻得力,将有助于促使房价合理回归。但是,公众最担心的,仍是政策的约束力和执行力。

首先,打击囤地并非是无法可依,这处的通知,力度上也未见“加重”。《闲置土地处置办法》规定,商业开发用地,闲置超过1年,要征收土地闲置费;闲置满2年,就可以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。这样的规定,与“不得再拿地”的处罚相比,还要严厉一些。但是,仅是国土资源部通报的1457宗闲置土地,动辄闲置好几年甚至十几年,被无偿收回的鲜有耳闻。并且,到底有多少土地在闲置,也是一个谜,业内人士只是说,上了“黑名单”的仅是冰山一角。

其次,闲置土地被公示之后,缺乏严厉的问责和追究。对那些上了黑名单的地方政府,有关部门曾表示要约谈、问责,但是,好几个月过去了,约谈的情况怎样,我们不得而知;计划的问责,也迟迟未见动静。其实,楼市很多问题,并不是无法可依,或者没有对策,也不需要太多的制度创新,只要执行既有法律法规,严格追究问责就好了。

很不幸的是,现在的楼市俨然成了有法不依的特殊地带,也成了政令不通的重灾区。在强大的利益共同体面前,相关法规和调控政策,往往遭遇打折执行,或者明或暗的抵制,政令不行,问责不力,再重的拳头,落下去也变得飘飘。如果政令连一个农村老太太都不相信,其执行力可想而知。

因此,当我们讨论楼市调控是否继续,是否应该出台房产税更严厉措施的时候,不能忽略了对既有政策执行情况的追问。有令不行,再多的调控政策也是枉然。具体到打击囤地土地这项工作,再发更多的通知,也不如有力地问责更有示范性。现在,国土资源部公布的闲置土地问责大限已到,严格执法,不妨就从这些上了“黑名单”的地方做起。

丁永勤

“弹性退休”并非特别靠谱

是否延迟退休的争论近期升温,推行弹性退休制度的呼声渐起(9月27日《法制日报》)。

早退有早退的好处,晚退有晚退的妙处,在退休年龄的纠结上,其实决策部门与公众的价值分歧始终有点鸡同鸭讲的味道:譬如制度设计的着力点在于社保的“口袋”,然后综合考虑人口结构、就业状况等因素;而公众的兴奋点显然比较分散——不同情况不同职位不同权力不同薪酬者,都在打自己的算盘。

于是,有折中者提出中庸之道的弹性选择——想走的走、想留的留,看起来皆大欢喜,各不得罪,甚至很多论者鼓吹“弹性退休制度是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有效措施”。但问题是,弹性退休真的那么靠谱吗?

一方面,弹性退休给“想退退不了”、“想留留不了”的部分群体提供了“弹性空间”,其结果很可能就是有利者要继续“奉献余热”,而普通民众在不平等的劳资关系面前却无法按时而退——弹性退休成了变相的“延长退休”,并鼓励了在退休问题上的合法寻租。



官员“宁自杀不辞职”是中了什么魔

浙江高院副院长童兆洪自缢身亡,公安机关认定为自杀。

童兆洪遭事:我得抑郁症数月,实在不堪忍受,难受至极,失去信心,特别是不能工作了……(9月27日《长江日报》)。

老百姓常说,好死不如赖活着,人不到万不得已走投无路的时候怎么会对自己下毒手?难道官员患病(许多还不是绝症)就只有自杀一条路?按照最普遍的想法,“不能工作了”那就干脆辞职看病或休养。无官一身轻嘛。而且工资福利一分不少。对老百姓来说,放着阳关大道不走偏

官员“宁自杀不辞职”是中了什么魔

偏自杀,到底怎么了?就是这样简单的道理,现在却成了许多官员迈不过去的一道坎。最近几年因患抑郁症或其他病症自杀的官员很多,但这其中却没有一人因病主动申请辞职,到底都中了什么魔?我推断,官员们宁自杀不辞职尽管有别的原因,更多是内心的恐惧。很多官员早已习惯了在权力和福利中生活,过惯了众星捧月的日子,一旦权力旁落,就会坐

虚报多得近亿元

新华社报道,浙江省杭甬运河项目绍兴市段、绍兴县段、上虞段等通过虚报概算,多取得中央和省投资9007.92万元。

虚报概算,就能多得经费,这成了某些地方热衷于搞项目的公仆们的捞钱法宝。上面拨的钱多了怎么办,这些官员自有打算,决不会为此发愁。譬如杭甬运河项目萧山段将工作经费287.82万元划入萧山长途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后,收入163万元现金,部分存于个人账户,还虚列会务费、用于职工香烟提货券和机关职工福利,就有点集体吃“回扣”、将公款经“洗钱”而化为私的味道。在这些贪心公仆看来,违规多要来

的公款,属于“不拿白不拿”的飞来之财,岂有将它全部投入公家的建设而不为小团体乃至个人谋利之理?于是,这近亿元的多余的资金中,相当一部分由姓“公”蜕变为姓“私”的命运恐怕就难以避免了。任何项目立项之后,相关人员编制预算时,都必须严格遵循国家的各项政策和法律法规,本着实事求是、精打细算的精神,为国家把好用钱关,为人民节俭办大事,而不可借机狮子大开口,多要钱乱要钱。谁若是以可以趁虚实施项目之机个人大捞一把,无疑是根本违背人民意志的犯罪行为,这类腐败行径理应承担党纪国法的严厉惩治。吴之如文/画

官员“宁自杀不辞职”是中了什么魔

卧不安。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社会上有一种“传统观点”,即使官员生病在家不上班拿工资也会被视为正常,而一旦辞职了就有“问题”了,正是因为这样,才酿成了一种官场畸形心态——情愿自杀不愿让权。

对待这样的现象怎么办?这就要求官员要放弃这种过于重视权位的心态。当然,这个任务交给官员,指望个人修养,是完全不靠谱的。用句官话讲,是一个“系统工程”。官员们,制度制定者们,努力吧。朱少华

形神兼备方能“以文化人”

今天的中国,每年创作的歌曲、小说、电影、电视剧等,堪称海量,规模空前。然而正如文化部官员前不久针对“低俗化”问题所发问的,其中能传唱传世、能与先贤留下的八万种历史典籍比肩的有多少?只怕答案不容乐观。

在一些创作者、出版商那里,不求“化人”,但求娱人,不求启迪心灵,但求吸引眼球,不求担当传扬文化的使命,但求趁早成名赚足利润,已成为一种创作生产的价值导向。然而,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之中,一代受众已然产生视觉与审美疲劳,延续这种创作生产方式又如何能让其文化产品留住受众?更令人深思的是,不但庸俗、低俗、媚俗的文化产品已难留住受众,就是某些以弘扬主旋律、倡导主流价值为己任的所谓“高雅”文化产品也难留住受众,屡屡出现“政府是投资主体、领导是基本观众、洋奖是主要目标、仓库是最终归宿”的尴尬现象。有人说,正是主旋律的使命限制了思维的空间。给人事实表明,这只是一种不得门径的无能借口。给事以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的美国大片《烈火雄心》、《阿凡达》就没有“主旋律”?让观众眼馋流泪、赚得票房和口碑的国产大片《唐山大地震》就只有“商业化”?

言而无文,行之不远。任何一种文化载体,无论色彩上怎么美轮美奂,造型上怎么新颖奇特,音效上怎么震撼全场,如果缺乏那种风骨神韵、价值理念,则多是一场“视觉盛宴”,只会带来感官的刺激与享受。流芳百世、享誉中外之作,莫不形神兼备。尽管《唐山大地震》在如何凝“神”聚“气”上还不是牛刀小试,但它真正打动人心的,正是气贯全篇的精神与价值内核。有无神的文化产品,是不可能“化人”的,也注定是短命的。

有神无形,同样行之不远。可以说,“中国精神”、“中国价值”从来未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缺席过,自始至终都在照耀着中国人前行,并得到丰富和发展。遗憾的是,我们的许多文化产品还不善于表达它。撇开主流,执著于极端个性化的精神叙事,固然难以赢得大众的共鸣;但用大而无当的方式、居高临下的气势、顶礼膜拜的讴歌去表达,受众更会在不能承受之重中自觉远离。唯有选择那些能够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群体人格的精神价值,从人性的角度去解析,用平等的视角去阐述,以艺术的手段去展现,才能真正走进大众的内心,让人们在欣赏与享受中自我升华,在春风化雨、润物无声中“化大众”。

今天,在世界文化交流交融频繁的大势下,我们该如何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提取当代的精神元素,从当代中国人的奋斗实践中提炼时代共同价值?进而而艺术地赋予于我们的多样文化载体中,在普及中让公众更好地享受文化的熏陶,在“走出去”中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?这是值得每一个文化工作者深思的课题。陈家兴